

論切支丹時代在日耶穌會與葡商之關係

張蘭星

【提要】 16世紀40年代，葡萄牙人首次來到日本，其後他們在日本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傳教和經商活動，一些學者稱這段時期為日本“切支丹（基督教）時代”。在日本，耶穌會與葡商保持著特殊的教商關係。最開始，他們相互利用、合作互惠；當葡日貿易逐漸成熟後，教商關係出現裂痕，葡商的地位超越傳教士；進入17世紀，德川家康全面禁教，葡商不得不與耶穌會斷絕關係。不過，信仰天主教的葡商不可能從根本上棄教，教商關係始終藕斷絲連。這種模糊的牽連觸怒了將軍，商人們也最終被驅逐出日本。切支丹時代的教商關係，是16~17世紀葡日交流交往的突出特點，也是導致葡日關係由盛到衰的重要原因。

【關鍵詞】 耶穌會 葡商 日本教商關係

【中圖分類號】 K313.3 **【文獻標識碼】** A **【文章編號】** 0874 - 1824 (2013) 03 - 0084 - 08

切支丹時代^①，葡人在日本進行的主要活動是傳教（天主教）和經商。雖然16世紀末17世紀初，歐洲天主教的多個教派都來日傳教（方濟各會、耶穌會、多明我會等），但在日本徹底禁教前（1614年）前，在日傳教的主角一直是耶穌會；同樣，雖然四個歐洲國家的商人都抵日經商（西班牙、英國、荷蘭、葡萄牙），但在日本鎖國（1640年）以前，對日貿易量最大、對歐日關係影響最大的商人當屬葡人。從表面上看，耶穌會的傳教與葡人的經商沒有必然聯繫。但在日本，教商一直存在一種特殊關係（本文所指的教商關係僅指在日耶穌會與葡商之關係）。雖然雙方也出現過矛盾，雖然商人曾試圖擺脫傳教士，但共同的信仰始終讓他們保持一定聯繫。這群天主教徒無論在日本經商還是傳教，都非孤立的活動。教商關係問題既缺乏研究，也值得研究，故本人試做探討，以期拋磚引玉。

一、初期的教商關係

葡人登陸日本種子島（1542年）至16世紀80年代的這段時期可稱為葡日貿易初期，或者稱為耶穌會在日傳教初期，此時的日本正處於戰國分裂狀態。期間，日本大名、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形成了特殊的三角關係。16世紀中期，日本人購買外貿商品主要通過4種途徑：自己派船出海；完全或部分依靠他國船隻運進貨物；與外國商人合資經營，按份額分攤利潤；直接購買外國船運

來的商品。雖然有4種選擇，但大名還是喜歡直接從葡船購買商品。因為明朝中止了勘合貿易，中日間的走私貿易也被限制，大名自己派船出海或與他國船隻合作，不但麻煩，花費還大。當時的日本也處於戰亂，限於政治、技術和資金等因素，大名們暫時放棄了海上主動權。依賴葡船進行貿易，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。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非常大。傳教先鋒沙勿略也發現，幾乎所有大名都想參與外貿，以獲得中國商品：“葡船的噸位很大，即便只有一艘葡船抵日，其運載的貨物也可以給任何一個大名帶來巨額財富。誰爭取到葡船，誰就得利”。^①一到貿易時節，大名們便爭先恐後地迎接葡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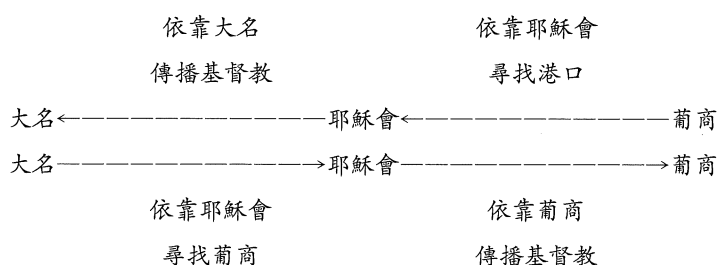
參與貿易的戰國大名主要指九州大名，他們可分為幾種情況：（1）基督教（本文提到的基督教都指天主教）大名。大名皈依基督教的原因較複雜。簡單地說，有些是真心信教，有些是受皈依者影響而信教，還有些僅為吸引葡船而信教。^②無論如何，這些大名都努力使傳教與貿易結為一體，充分享受貿易帶來的利潤。大村氏、大友氏和有馬氏都屬於這類大名。這些大名總是希望獨佔貿易，他們要求葡船僅在自己的領地開展貿易，不要去其他地方。（2）歡迎貿易，但討厭基督教的大名。這些大名不信仰基督教，但為了獲得外來商品，被迫允許傳教。松浦氏和島津氏就屬於這類大名。這些大名往往不能堅持自己的立場，基於鄰國內反基督教勢力的強大，他們最終只能忍痛放棄葡船。（3）寧肯放棄貿易，也不能容忍傳教的大名。四國的長曾我部氏為這類大名的典型代表。但他們仍然希望開展貿易，於是通過走私、間接交易或搶劫葡船的方式得到貨物。

葡萄牙商人分為走私商人與合法商人，合法商人也稱為官商，受大船長^③管理。走私商最初是主角，後來官商逐漸掌握主動，成為新主角。自由貿易^④給葡商帶來巨大財富，澳門葡人逐漸成為亞洲新貴。最初，葡商與耶穌會關係融洽，他們互相依靠。商人自然需要一個友好、安全的環境進行貿易，在日耶穌會恰好熟悉日本的情況。他們經常推薦港口，或幫助葡商尋找合適的貿易夥伴。這一時期，葡船停泊的港口通常是耶穌會的傳教區。1555年以前，耶穌會集中在九州的薩摩、大隅、日向等地傳教，後來又轉移到大友氏領地（豐後地區）活動，他們還活躍於松浦氏的平戶。因此，這些港口成為葡船經常抵泊之地。另外，葡王和教皇認為，亞洲的葡商有義務支持和幫助耶穌會，特別在日本這種“新開發”的地區。教商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傳教士初到日本之時。葡船不但運載傳教士，還為耶穌會提供各種物資，葡商是他們在日本唯一信賴的夥伴。據耶穌會傳教士弗洛伊斯記載道：“那時，耶穌會缺乏任何方式的援助，唯有葡商能夠幫助我們”。^⑤16世紀50年代，大船長杜阿特·達·伽馬（Duarte da Gama）與傳教先鋒沙勿略建立了良好關係，他經常幫助耶穌會渡過難關。曾兩次到達日本的葡商吉爾海墨·皮雷拉（Guilherme Pereira）也對耶穌會特別慷慨，沙勿略多次收到他的捐贈。^⑥

天主教有規定，傳教士不得參與或進行商貿活動。日本卻是一個例外，在日耶穌會扮演了協調大名與葡商關係的中間人角色，參與商業活動是他們進行傳教的一個重要特點。首先，耶穌會在日本實行“自上而下”的傳教方針，他們鼓勵大名信教，然後誘使大名帶動領民（領地內的臣民）集體改宗。耶穌會有意識地以貿易為誘餌，施行佈道。沙勿略曾經強調，在日傳教必須依靠商人。1549年，他在信中提到：“我們必須緊密聯繫葡商，因為他們正好要去日本經商。若要順利開展傳教活動，就必須聯合商人，幫助他們就是幫助我們自己”。^⑦沙勿略意識到，單獨傳教的困難多，而且收穫小。耶穌會經常誘導葡船去指定地方停靠，有時甚至對葡商施壓。對於耶穌會的安排，葡商一般都遵從。其次，傳教士的素質決定了他們能夠擔任大名和葡商的中間人。傳

教士必須學習日語，他們都有一定的語言基礎，這是初到日本的葡商不具備的條件。傳教士相對熟悉日本的政治、經濟和地理，商人正好需要這方面的信息。作為中間人，耶穌會盡量去維持大名和商人之間的關係。當葡商在日本遇到麻煩時，耶穌會經常伸出援助之手。有一次，葡船在平戶遭到襲擊，耶穌會馬上派人調查。他們還繪製了九州基督教區與非基督教區的地圖，並努力尋找適合葡船停靠的港口。再次，大名和日本人不能正確地理解歐洲的教與商。日本人受儒家學說影響較深，等級觀念深入人心。在日本人看來，葡商非常尊敬傳教士，因此一度認為傳教士的地位更高。好像只要耶穌會願意，他們可以隨時安排、調度葡船。^⑩大名們往往以為討好了耶穌會也就把握住了商機，這也成為一些大名改宗基督教的動因。以下關係圖可以直接反映大名、耶穌會和葡商之間的關係。

大名、耶穌會和葡萄牙商人關係圖



據統計，1551~1585年，5位西南大名先後13次以葡王、果阿總督或教皇為對象，派遣使節或致以書信，試圖與歐洲人建立密切關係。^⑪而這些外交姿態，幾乎如出一轍，先是表示要在自己的領地內保護傳教士，其後便提出具體的貿易要求。豐後大名大友宗麟的書信頗具代表性：“余乃葡王陛下之僕人和朋友，對上帝及在余領國內之天主教徒及葡人一同予以庇護和厚待，余將在上帝賜予的一生中，始終不渝。望閣下致書總督，余具有接受大炮贈與之資格……余若能保衛領地並得以繁榮，則領地內天主堂及信徒乃至來此地之葡人亦可同享繁榮”。^⑫不難看出，日本大名為了吸引葡船，競相對傳教士表現出“熱情”，並提供各種優厚條件歡迎葡商。貿易、宗教、權力、利益便這樣“和諧”地聯繫起來了，此時的教商關係可謂處於“蜜月期”。

二、教商矛盾

在豐臣秀吉禁教前（1587年以前）^⑬，耶穌會與葡商一直保持著合作關係。耶穌會傳教士范禮安在1580年提到：“我們必須瞭解，在日本對我們幫助最大的是葡商。但這僅限於九州部分地區，在豐後及京都，我們沒有看到葡船。實際上，日本大名並不富裕，他們歡迎葡船來售賣商品。這是個好消息，因為在歡迎葡商的同時，他們也同意耶穌會傳教。有些大名甚至主動提出讓傳教士乘坐葡船到其領地。大名的言行在領內有如聖旨，如果大名要求民眾皈依基督教，他們也會服從……”^⑭不過好景不長，隨著葡日貿易的開展，雙方逐漸產生分歧。他們表面上尚能保持友好，實際上已經出現不和因素。耶穌會經常抱怨葡商的固執與無知。范禮安在1583年描述道：

如果葡商能更好地考慮耶穌會的利益，而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私利；如果他們每年都更換一個港口進行貿易；如果他們能遵照耶穌會的建議開展貿易，那整個傳教事業將成良性發展。但葡商並不希望這樣，他們的活動與耶穌會的期望背道而馳（葡商希望固

定在某港口搞貿易)。當然，我們無權強迫大船長聽從我們的指揮，但是我們可給予他們必要的建議和適當的提醒，以避免他們犯錯。葡商只有聽取我們的建議，大家通力合作，利益才不會受損。只有我們可以說服大名及其家臣信教，只有在教區開展貿易才是安全的。賈耐勞 (Melchior Carneiro) 擔任中國 (明朝) 主教時，就經常這樣做。^④

可以看出，耶穌會認為葡商應該聽取他們的建議，若不這樣，就會走入“迷途”。耶穌會還強調，葡商選擇港口時，最好遵照耶穌會的指示，而且葡船最好在他們的指引下，經常改變停泊的港口。最初，商人們對耶穌會惟命是從。後來，他們漸漸懷疑耶穌會的指導和指示是否正確。耶穌會的“好意警告”似乎有些危言聳聽，他們似乎在誇大自己的作用，葡商認為沒有必要對他們畢恭畢敬。隨著葡日貿易走向成熟，葡商發現自己的地位、作用似乎要大於傳教士。商人的“嗅覺”非常靈敏，他們感覺傳教士們只起到“順水推舟”的作用。在哪個港口開展貿易，實際上是葡商、耶穌會和大名共同商議的結果。如果葡商按照耶穌會的構想，一年更換一次港口，他們可能會失去固定的貿易夥伴。因為任何大名都不願意與對手分享商品，任何大名都想獨吞貨物。另外，如果去陌生的港口，葡商可能會受到惡劣天氣、不利地形或複雜政治因素的影響，而無法開展貿易。在日本，參與大名之間的爭鬥不是明智之舉，甚至非常愚蠢。葡商正是看到這一點，才沒有輕易採納耶穌會的建議。比如，同為基督教大名的有馬氏和大村氏，其實是多年宿敵。耶穌會在兩地都有傳教士，他們都希望葡船來搞貿易。如果葡船頻繁奔波於兩地，任何一方都不高興，因為任何一方都無法獨享利益。況且這還是基督教大名的領地，如果在非基督教地區，情況可能更糟。總的來說，耶穌會的某些提議並不實際，葡船每年只在固定時間去日本一次，他們不可能在多個港口停留。大船長經常為選擇港口而犯難，稍不注意，就會得罪大名。因此，最好的方法是在某港口開展穩定的互市貿易，讓大名們自己解決矛盾和衝突。這樣看來，葡商的考慮應該是合理的。1571年，天然良港長崎被開闢出來，葡商將此地作為商船的固定停泊點。耶穌會拓展傳教地區的計劃暫時被商人們的決定打斷，教與商進入了一個“博弈”狀態。

1587年7月，秀吉發佈“傳教士放逐令”，開始禁教。雖然這次禁教並不徹底，但葡商和耶穌會的角色、地位發生了較大變化。由於秀吉採取“禁教不禁商”策略，葡商的地位提高，耶穌會的作用被忽略，傳教士“中間人”的角色被淡化。即便沒有傳教士從中協調關係，葡商也能開展貿易。^⑤學者科那德·斯齊諾卡爾 (Conrad Schirokauer) 認為：“一開始，耶穌會傳教士的能耐大於葡商，後來商人在日本的地位和作用超越了耶穌會”。^⑥范禮安曾比喻耶穌會和葡商是“上帝與財神”的關係。但在禁教後，“上帝”似乎也要屈服於“財神”。范禮安也抱怨，耶穌會已經不能控制葡船的活動。葡商處處受到歡迎，而且財力雄厚。耶穌會卻處處受限，而且缺乏活動資金。在日耶穌會的總部設在九州，而非京都，與貿易有很大關係。范禮安說：“因為葡商每年都去九州開展商貿活動，所以耶穌會在九州的勢力較大，聲望較高”。^⑦范禮安曾考慮將傳教中心從九州移至 (京都) 畿內，但這顯然不現實，因為耶穌會無法離開葡商和葡船。另外，長崎開埠後，耶穌會每年還可收取港口稅。^⑧1592年，范禮安感到耶穌會在九州、京都的傳教效果大不如前，並且耶穌會對葡商的依賴越來越大。他在 (寄往羅馬的) 報告中提到：

我們能夠在日本傳教，從開始到現在一直都依靠葡商。首先，傳教士必須乘坐葡船，才能到達日本。其次，耶穌會的大部分傳教經費來自葡日貿易的分配額。再次，葡船帶來的商品吸引了當地大名，日本人才贈予我們土地、才允許傳教。如果葡商和葡船不再到來，我們將感到無助和恐懼，傳教士也許會被趕出日本。總的來說，葡日貿易是

耶穌會能夠立足日本的主要原因。如果沒有商人，傳教士可能會遭遇不幸。不過，如果他們離開我們，也會同樣。^⑨

范禮安上述的最後一句話意味深長，他看到了日本人真正需要的是貿易，而非宗教。同時，他也預言葡商與耶穌會的關係不可能一刀切斷，他們乘坐的是“同一艘船”。事實證明范禮安的預見是正確的。1614年家康徹底禁教後，葡商雖然在日本繼續堅持了25年的貿易（1640年，葡人雖然來到日本，但沒有進行貿易活動），但最終還是被驅逐。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葡商與耶穌會始終藕斷絲連。

三、禁教與禁商

如果葡萄牙不是天主教國家，葡日的交往可能更長久。葡、日雖然同為王權專制國家，但葡國更是天主教國家，教皇權威時常凌駕於王權之上，葡國臣民（葡商）是葡王與教皇的共同奴僕。相比新教徒荷蘭人，葡人的這一“缺點”是致命的，因為葡商無法擺脫與耶穌會的宗教關係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在日葡商並非純粹商人，而是帶著傳教使命的商人，他們始終與耶穌會有牽連。

日本人瞭解歐洲的教商關係經歷了一個過程。最開始，他們搞不清楚耶穌會與葡商的關係，認為歐洲的教商密不可分，一些日本人甚至以為耶穌會的地位最高。到了安土桃山時期，豐臣秀吉頒佈了禁教令，耶穌會的“神光”被褪去。此時的日本人已經和葡人交往多年，他們認為“上帝”與“財神”並非一體，日本人可以放棄“上帝”，只選擇“財神”。德川幕府建立後，家康更是全面地瞭解了歐洲的政治、經濟和宗教情況。學者博克舍談到：“日本統治者害怕基督教威脅其封建統治，相比軍事侵略或殖民活動，幕府更害怕意識形態的顛覆。家康也認為基督教具有潛在威脅。”^⑩博克舍還指出：“秀吉、家康為了發展外貿，一直容忍傳教，但他們內心極其厭惡基督教。”^⑪德川將軍禁教的根本原因就是害怕基督教觸動日本的封建基石。1614年，家康毅然採取行動，開始系統地清除日本基督徒。^⑫傳教活動成為阻礙葡日貿易持續開展的最大障礙。家康明確指出，禁令僅針對傳教士，日本仍然歡迎葡商。正是因為如此，葡商並未充分意識到，他們的天主教徒身份其實是一枚“定時炸彈”，教商的特殊關係對他們極為不利。葡商不可能放棄自己的信仰，葡人不能背離教皇（鼓勵傳教）的旨意，這讓商人們走上不歸之路。

禁教後，耶穌會一直沒有放棄對日傳教事業。他們潛伏於日本，秘密佈道。儘管許多傳教士和信徒被迫害或被迫改宗，但基督教在日本已經有一定基礎（17世紀初，日本已經有70多萬天主教徒），幕府要徹底根除基督教對平民的影響比“清洗”上層建築（基督教大名）更困難。只要葡船繼續出現在日本海岸，傳教士就有機會進入日本，他們只需偽裝成商人或船員即可。耶穌會傳教士米格爾·德·卡瓦爾霍（Miguel de Carvalho）就曾假扮成印度士兵潛入日本，當時所有的葡船船員（包括乘客）都必須被嚴格檢查，只有印度士兵和黑奴除外。米格爾上岸後，一直躲在日本教徒家中。他在那裡等待天草島教徒的接應，天草島是日本基督徒秘密活動的總部。禁教後，多數傳教士通過這種方式潛入日本。還有些傳教士堅信自己能夠重返日本。耶穌會廣泛收集日本、荷蘭和英國的情報，他們獲取情報的能力讓尚在日本進行貿易的葡商也自嘆不如。甚至還有傳教士建議以武力威懾日本。1614年禁教以後，傳教士在日本進行的秘密宗教活動多數與葡商有關，這讓幕府將軍越發不能忍受，葡日貿易受到消極影響。

1614年，大船長若昂·塞勞·達·昆哈（Joao Serrao da Cunha）選派了4~5名使節，帶上重

禮謁見家康，提出保留一座教堂的請求。家康非常喜歡禮物，表示歡迎葡商，但堅決反對保留教堂。1615~1616年，20多名傳教士扮成商人潛入日本。^②1617年，大船長羅普·薩門托·德·卡瓦爾霍（Lopo Sarmiento de Carvalho）向德川秀中請求在長崎建倉庫。因為葡商認為，他們很難在幕府規定的時間內將貨物售完，建倉庫是為了堆放剩餘商品。但請求立即被拒絕，因為將軍懷疑葡人的真實目的，擔心倉庫會成為藏匿傳教士的地方。1618~1621年，18名傳教士秘密潛入日本。^③之後，日本加大對葡船的檢查力度。這樣，傳教士假扮成士兵、海員或商人的辦法就行不通了。1621年，大船長傑羅尼姆·德·馬塞多·德·卡瓦爾霍（Jeronimo de Macedo de Carvalho）試圖去營救兩名被困於平戶的傳教士。此外，他還暗中協助傳教士潛入日本。幕府瞭解情況後，逮捕了卡瓦爾霍及他的4名葡萄牙助手，卡瓦爾霍的貨物被悉數沒收。1624年，幕府禁止日本天主教徒前往海外，朱印船也不能雇用葡萄牙船員（朱印船是日本官方貿易船，幕府曾雇用葡人擔任朱印船的領航員）。幕府還要求葡、荷船長交出船員和乘客的名單。1625年，澳門使節第一次被幕府拒之門外，因為日本人在口之津逮捕了傳教士帕齊各（Francis Pacheco）。^④將軍認為帕切科一定是跟隨葡船而來，因此對葡商非常不滿。^⑤1626年，新任長崎奉行（幕吏）要求葡商書面保證與耶穌會脫離關係，不攜帶宗教物品到日本，同時不以任何方式資助日本基督徒。大量日本教徒只能逃往國外，有些去了印度，更多人前往澳門避難。同年11月21日，羅德里格斯收到澳門來信，信中提到：“幕府對葡船進行了更為仔細的檢查。他們甚至檢查船上的錢箱、包裹及一切可容身之處，以杜絕傳教士潛入日本。多虧上帝保佑，他們沒有發現什麼。……隨後，他們制定了嚴格的限制令。比如禁止運載彌撒用的葡萄酒、宗教書信、以及其他一切與基督教有關的物品。如果幕府發現這些東西，將燒毀葡船，殺死船員，甚至禁止貿易”。^⑥

1628年，幕府繳獲了一封秘密信件。信中附帶了一份葡商名單，他們曾資助耶穌會秘密傳教，其中還有大船長羅普·薩門托·德·卡瓦爾霍。按理說，他會被燒死。但卡瓦爾霍用金錢賄賂幕吏，才保住性命。^⑦1634年，羅普·薩門托再次遇到麻煩。其手下船員傑羅尼莫·路易士·德·谷維阿（Jeronimo Luis de Gouveia）私自攜帶了宗教信件，寫信人為澳門傳教士保羅·多斯·桑托斯（Paulo dos Santos）。信件內容並無大礙，僅是催促收信人（日本人）還錢。但信件被查獲後，谷維阿還是被投入了監獄，最後被處以火刑。^⑧幕府告誡澳門，最好將桑托斯送往印度，以切斷他與日本的聯繫。同年，幕府禁止葡人佩戴念珠或十字架，他們希望日本人能儘快忘記基督教。1637年，一名奧斯定修士（歐洲人）在日本被捕。經嚴刑拷打，修士供認出葡船船員杜阿特·寇里阿（Duarte Correia）曾幫助過他，寇里阿立即被關入大村氏的監獄。雖然葡方盡力營救，但寇里阿仍然於1639年5月被處以火刑。面對如此殘酷的宗教迫害，傳教士還是沒有放棄日本的事業。1637年，5名傳教士從馬尼拉出發，再次秘密潛入日本。^⑨1637年的島原起義讓葡商的處境更尷尬。島原起義爆發於九州有磨村，17世紀初，該地區是基督教大名的領地。1614年禁教後，這裡聚集了大量基督教秘密組織和教徒。1637年，島原的基督徒聯合農民發動武裝起義，人數約2萬，這是一次帶有宗教性質的農民起義。此時的葡日關係處於緊張狀態。不管葡商是否參與過起義，都成為被懷疑對象，因為他們是天主教徒。^⑩由於島原軍燒毀佛教和神道教寺廟，將軍更是認為葡商暗中支持了起義軍。1638年2月，大船長卡斯特爾布蘭科打算到江戶謁見將軍，澄清事實。但將軍沒有召見大船長，卡斯特爾布蘭科甚至成為嫌疑犯。所有葡人被禁錮在船上，不能上岸，也不能做生意。

在1614年禁教後，葡商一直沒有斷絕與耶穌會的關係，正是這層關係破壞了葡日貿易。葡

人若想繼續經商，就必須與傳教士劃清界限，就必須棄教或改宗。1635年，幕府開始考慮葡人的去留問題，奉行遣派人試探葡方的態度。葡人也得知，若要繼續貿易，就必須剪髮、剃須以及身著日本衣服。^①對於這些屈辱規定，葡人感到驚奇、失望和迷惘。但他們還是選擇繼續貿易，為了利潤，他們寧可受委屈。但他們後來聽說，將來可能要面臨是否放棄基督教的選擇，於是又表示寧肯放棄貿易，也不背叛信仰。如果不棄教，葡人只有期待幕府垮臺或日本重返戰國時代。但幕府的統治非常穩固，這樣的期望只能是幻想。導致葡人失去日本市場的主要原因並非英、荷的競爭，他們與天主教的牽連才是關鍵。禁教初期，葡商受到的影響不大，因為秀吉與家康都鼓勵外貿活動。但二代將軍秀忠與三代將軍家光並不看重外貿，他們更關心統治問題。秀忠、家光認為，只要允許葡船來日，傳教士就不會消失。同時，英國人、荷蘭人奉行“只貿易不傳教”的策略，而且大肆宣揚天主教威脅論，這讓將軍更傾向於和新教徒做生意。1637~1638年的島原起義證實了日本統治者的擔心。在血腥鎮壓起義後，將軍不再猶豫，決定徹底驅逐葡人，直接鎖國，以斷絕與天主教的任何關係。^②范禮安的預言最終得到了應驗，身為天主教徒的葡商無法擺脫與耶穌會的關係，“財神”與“上帝”都被將軍驅逐出了日本。

從表面上看，在日耶穌會與葡商的關係經歷了由合作到破裂的過程。但實際上，雙方並未從本質上脫離關係，教、商之間始終藕斷絲連。耶穌會在日本的傳教並非單純的佈道活動，同樣葡商對日本的貿易也非純粹的商業活動。這是切支丹時代葡人對日開展教、商活動的重要方式，是16~17世紀歐日交流交往的突出特點，也是17世紀日本統治者決定鎖國的重要原因。

①“切支丹”為日語漢字，意為基督教。“切支丹”這一叫法常出現於日語文獻中。《劍橋日本史》第四卷稱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的日本歷史為“Christian Century”。參見：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*, Volume 4, Early Modern Japan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1, p. 302.

②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Conrad Schirokauer, *A Brief History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*, Belmont: Thomson Wadsworth, 2006, pp. 117, 133, 104.

③在皈依基督教的大名中，不乏真誠信仰者。但多數大名是為了貿易而改宗。若不能招徠葡船，他們可能會立即拋棄基督教。見：Conrad Schirokauer, *A Brief History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*, p. 133.

④16~17世紀，在澳門—日本航線上，擁有航線貿易特權的葡人叫大船長，大船長是航線上的最高指揮官，由葡王任命。大船長的葡語為Capitao-Mor，英語為Captain-Major。“大船長”的中文翻譯不太統一，其他翻譯還有“總指揮官”、“司令官”、“長官”或“甲比丹”。

⑤這裡的“自由貿易”不同於現代意義的自由貿易，簡單地說就是指日、歐雙方最初的貿易活動不受兩

國國王、官僚或官方的限制。

⑥Helena Rodrigues, “Local Sources of Funding for the Japanese Mission,” *Bulletin of Portuguese/Japanese Studies*, Vol. 7,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, 2003, p. 123.

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C. R. Boxer, *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*, Macau: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, 1988, pp. 25, 157-158, 128, 137, 143.

⑧Henry James Coleridge, *The Life and Letter of St. Francis Xavier*, Vol. 2, New Delhi: Subham Offset Press, 2004, pp. 271-272.

⑨Jonathan Norton Leonard, *Early Japan*, New York: Time-Life Books, 1968, p. 118.

⑩岩生成一：《鎖國》，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1980年，第32頁。

⑪柳谷武夫編：《イエズス會士日本通信・下》，東京：雄松堂，1968年，1568年9月13日大友宗麟書簡。

⑫日本由分裂走向統一後，豐臣秀吉是首位禁止基督教傳播的統治者。不過秀吉的禁教並不徹底，很多傳教士仍然留在日本傳教。繼秀吉頒佈“傳教士放逐

令”後（日本漢字寫作“伴天連追放令”），沒有進一步頒佈後續限制令，似乎對基督教的“潛伏傳教”有意默認。參見李小白：《信仰·利益·權力——基督教布教與日本的選擇》，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56頁。

⑬⑭⑰C. R. Boxer, *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-1650*, Manchester: Carcanet Press, 1993, pp. 93, 97, 95.

⑮秀吉對禁教非常矛盾，他擔心傳教會帶來麻煩，但同時希望葡船來日經商。秀吉收回長崎後（長崎曾經被大村氏獻給耶穌會），唯恐葡船不會再來。其後他又發佈禁教令，更是害怕耶穌會阻止葡船來日。1591年，問題最終得到解決，葡船依舊到來，秀吉與果阿總督也表達了互通貿易的願望。此時，耶穌會對葡日貿易的協調、促進作用已經不大。

⑯1580年，肥前大名大村純忠打算將長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區獻給（日語稱為“寄進”）耶穌會，作為日葡貿易的固定港口。作為回報，葡商每年支付1,000杜卡特（ducat，1杜卡特大約是1兩白銀）港口稅，由耶穌會和大村共用。

⑰C. R. Boxer, *Portuguese Merchant and Missionaries in Feudal Japan, 1543-1640*, London: Variorum Reprint, 1986, I-9.

⑱George Elison, *Deus Destroyed, 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*,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3, p. 73.

⑲另說，1615~1618年，約20名耶穌會傳教士假扮成商人，來日秘密傳教。參見：C. R. Boxer, *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-1650*, p. 366.

⑳㉑高瀨弘一郎：《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》，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77年，第651頁。

㉒1614年禁教時，帕齊各離開日本。1615年，他又扮成商人，返回日本。1622~1625年，他被任命為日本教區的秘密主教。幕府最終將其逮捕，處以死刑。

㉓㉔James Murdoch, *A History of Japan*, Vol. 2, New York: Ungar, 1964, pp. 628, 634.

㉕島原起義前，幕府規定：“葡商到達日本後，必須在50天內售完貨物。”1637年11月14日，葡船船隊（6艘）到達長崎，島原起義兩個月後爆發。恰好在這一年，葡船遲遲沒有離開日本，這讓將軍起了疑心。將軍猜疑葡商暗中煽動起義，支持島原叛亂。於是幕府對葡商展開調查，1637和1638年的大船長均被傳訊審問。參見：James Murdoch, *A History of Japan*, Vol. 2, p.663.

㉖李金明、李德霞：《眾多市場的開闢：16~17世紀葡萄牙在亞洲海域的生存法則》，澳門：《文化雜誌》，2007年第4期。

作者簡介：張蘭星，四川行政學院講師，博士。成都 610031

[責任編輯 陳志雄]